

# 国际政治研究与中国的粮食安全 (代序)

查道炯

## 一、粮食供应稳定:中国的敏感

像诸多国际政治研究中的非传统安全课题一样,粮食安全是审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及互动的重要课题。2007—2008年间,全球出现了新一轮粮食危机。其显著表征是国际市场的玉米、大米和小麦的平均价格翻了两番甚至三番。由于在谷物品种中,玉米、大米和小麦与满足人类的日常营养需求的相关度更高,所以,其价格超常规波动对一些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造成了冲击,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也引发了人道主义危机。

中国粮食市场的供求状况受这一轮全球粮食危机的影响有限。在同一个时期,就三大谷物品种的贸易而言,中国是净出口方。而且,同一时期中国境内的谷物价格低于国际均价。虽然同期中国的大豆净进口量快速上升,但仅大豆这一项还不足以成为导致谷物和油料国际贸易价格的全面攀升的诱因。

最新一轮的粮食危机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同时起作用的综合征。正如英国农业经济研究会与欧洲农业经济学家协会合办的一份期刊中的文章所分析,追溯这次危机的成因,可以总结出七个方面的因素:

- 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经济稳定增长,粮食消费需求上升,出口减少
- 恶劣天气导致澳大利亚、欧洲等粮食富余地区在2007年出现了减产
- 美国、巴西、欧盟实施的扶植生物燃料措施导致食料粮被挪作他用
- 石油价格走高,推高了粮食生产和运输成本,不利于稳定产量

\* 查道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1)

- 粮食贸易以美元定价,同期美元贬值,压抑了贸易空间
- 出现了囤积居奇现象,一些粮食富余国政府通过出口控制干预市场
- 全球大宗商品期货交易炒作频繁,对冲和指数基金涉足粮食交易<sup>①</sup>

由此观之,粮食价格的急剧波动是复杂的全球政治经济现象的一个缩影。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中的理解、分析粮食贸易和全球粮食市场的不稳定的习惯性思路,是把国家视作具有统一意志的理性行为体,把战略竞争视作政府行为的起源和归宿,其解释力是极其有限的。另外,分析这一轮粮食危机并不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

在事关保障本国粮食消费需求的课题上,多年来,中国一直是把通过努力稳定国内粮食总产量作为基本也是根本的路径选择,没有因为国际间政治、经济、舆论三方面的形势变化而动摇。例如,作为促进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的举措之一,中国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停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这意味着一项在中国有2600多年历史,涉及28万农税干部“饭碗”的税种,彻底结束了其使命。此外,国家制定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把我国耕地保有量到2010年和2020年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

作为中国社会对粮食供应安全敏感的一个表征,在大众舆论层面,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中国的耕地面积有一根“红线”(18亿亩)不容挑战。所以,2008年末,当在一项题为“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上,出现了怀疑维持一个耕地总量是不是有必要、有没有可能实现的声音的时候,课题主持者受到了一边倒的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报道突出指出该项研究系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完成。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一个外国基金会资助中国的学术机构或个人从事有关中国的公共政策课题研究,并不鲜见。一般情形下,这个资助来源不足以成为一个新闻性话题而引发公众讨论。这项有关中国的土地政策研究的资助来源之所以成为话题,是因为它折射了人们对粮食供应安全的高度敏感。<sup>②</sup>支撑这种敏感的逻辑是:一个外国基金会出资研究中国的公共政策,不能排除含有隐性损害中国的根本利益的企图。

事实上,国内外围绕中国的粮食需求如何才能满足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也没有定论。至今,基本上形成了四大主张。

(1) 中国无力生产其国民所需的粮食,必须大量进口。中国需求会引发地区乃至全球粮食危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发展中(贫粮和低收入)国家。

---

<sup>①</sup> Colin A. Carter, Funing Zhong and Jing Zhu, "China's Role in the 2007-2008 Global Food Price Boom and Bust," *EuroChoices*, Vol. 8, No. 2, 2009, p. 17.

<sup>②</sup> 沈强:《“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成果公布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讨论,守住“18亿亩红线”方能确保粮食安全》,《中国经济导报》2009年1月6日,第A01版。

(2) 通过农业资源潜力开发和生产技术改进,中国能保持粮食自给率 90% 以上。中国对世界粮食市场的需求有限、可控。

(3) 中国虽然能保持 90% 以上的粮食自给率,但因水土资源紧缺、生态环境问题,为从长计议,应选择适当加大粮食进口。<sup>①</sup>

(4) 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必通过控制耕地数量来实现,通过农业科技进步,特别是依靠国际粮食市场,便可得到保障。

近期出现并引起争议的是上述第四项主张。

一方面,讨论上述四个命题所要求的专业知识超出了国际政治研究学科的范畴。事实上,围绕如何预测中国及全球的粮食供需状况的可能变化,如何运用中国能够独立支配的生产要素影响粮食生产,乃至我国的粮食自给率的计算、自给率目标的涉及等基础性课题,都是农业经济学家们和政策专家们继续争论的话题。<sup>②</sup>

另一方面,粮食的跨国流动却是影响我们专业从事国际政治研究者判断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外交环境的重要参照点。没有比粮食流出地的国家政府公开或隐形地干预粮食进口方的努力更能体现前者恶意挑战/对抗意图的外交行为了。那么,国际政治研究对粮食政策讨论所应该做的贡献之一,便是帮助研判这种针对中国的恶意行为是否会发生。

这是一个绝不简单的挑战。即便是在粮食自给有余的情形下,也容易出现误判。例如,1994 年,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莱斯特·布朗以“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为题,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粮食自给能力的担忧。布朗的这个提问,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广泛的争论。农业政策专家们更倾向于从布朗的言辞中“取其精华”,讨论如何优化中国的粮食政策。<sup>③</sup>而国际政治问题研究者则强调了要“去其糟粕”,布朗的文章被认定是为苏联解体后盛行的“中国威胁论”帮腔助威,必须进行反驳。这种定性在政府部门出版的第一份《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1996 年)得到了体现。白皮书的结尾段落,毫不含糊地要批深批透(以)布朗(为代表)的(西方反华势力的)言辞:“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西方就有人预言中国政府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历史早已宣告此类预言的彻底破产。未来几十年,中国虽然面临耕地少、人口多、粮食需求压力大的现实,但也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

① 唐健、陈志刚、赵小凤、黄贤金:《论中国的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与茅于軾先生商榷》,《中国土地科学》2009 年第 3 期,第 4—10 页。

② 例如,王更新:《我国粮食自给率问题研究》,《安徽农业科学》1997 年第 16 期,第 4982—4984 页。郭燕枝、郭静利、王秀东:《粮食安全问题判断的另一视角:我国粮食自给率和谷物自给率之比较》,《江苏农村经济》2008 年第 1 期,第 61—62 页。

③ 李岳云:《“谁来养活中国”的争论及其启示》,《农业经济研究》1996 年第 10 期,第 2—6 页。林自新:《十年前受到严厉批判,今年他又“卷土重来”:美国学者谈中国食物安全战略》,《科学决策》2009 年第 5 期,第 16—19 页。

有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和办法,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生产积极性,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实践将会向世界证明:中国人民不仅能养活自己,而且还将使自己的生活质量一年比一年提高。中国不但不会对世界粮食安全构成威胁,还将为世界粮食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sup>①</sup>

事与愿违,中国的谷物产量在1999年开始下降,市场需求必须靠减少储备库存才得到了基本满足,2004年中国净进口了800万吨小麦才满足了市场需求。布朗在其报告中突出的关于中国水资源短缺、农田减少、环境恶化等问题越来越现实。也就是在2004年,时隔18年后,明确无误地发出政府政策优先信号的中央一号文件,又回到了与粮食供应高度相关的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而且延续至今。<sup>②</sup>

而今布朗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成了被邀请来中国共同研讨中国农业问题的座上宾。<sup>③</sup>回过头来看,类似布朗有关中国粮食问题的逆耳之言,在国际问题研究界一开始所遭受的批判和排斥,在众多的因素中,除了“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所激发的习惯性反应之外,也有可能和语言转换所传达的意境相关。“Who will feed China”这个表达被译成“谁来养活中国”。这个表达颇具感情色彩,容易被理解为一方给与另一方“救济”、“施舍”。倘若译成类似“如何满足中国的食物需求”的表达,则更具描述性。

作为对比,我们不妨注意一下美国《科学》杂志在1998年出版过一篇有关中国的能源需求的短文,其题目就是“谁来满足中国的燃料需求”(who will fuel China)。<sup>④</sup>这个表达没有成为一个广受中国的国际问题学者关注,是不是与其中的“燃料”(fuel)一词难以翻译成类似“养活”这种流利、口语化的中文有关呢?

在美国,关于中国的粮食需求是否会成为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压力这个话题,也出现过批评布朗担忧过头的研究论文。<sup>⑤</sup>不过,相关议题成为公众话题后,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界中也不乏形而上学的言辞。美国政治和外交决策机构,卷入了这场围绕未来不确定性的讨论。一时间,中国的粮食自给能力被赋予了较多的与粮食的生产和贸易并不直接相关的内容,而成为跨太平洋政治喊话的一部分。<sup>⑥</sup>

所幸的是,最近一轮全球粮食危机,没有导致又一场中国与西方(美国)的国

① 《中国的粮食问题》,参见 [http://www.gov.cn/zw/gk/2005-05/25/content\\_972.htm](http://www.gov.cn/zw/gk/2005-05/25/content_972.htm)。

② 参阅郑有贵、李成贵:《一号文件与中国农村改革》,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③ 段聪聪:《“谁来养活中国”仍是问题》,《环球时报》2008年6月22日,第1版。

④ Thomas Drennen and Jon Erickson, “Who Will Fuel China,” *Science*, Vol. 279, March 1998, p. 1483.

⑤ Robert Paarlberg, “Feeding China: a confident view,” *Food Policy*, Vol. 22, No. 3, 1997, pp. 269-279.

⑥ Alanda Roland, “Feeding fears: competing discourses of interdependency, sovereignty, and China’s food security,”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0, Iss. 1, January 2000, pp. 55-76.

际问题研究界之间的大辩论。这其中,除了过去30年间中国与国际谷物贸易市场的互动过程基本稳定这个基本事实之外,部分原因可能是气候变化课题挤占了讨论粮食及其他全球性挑战的注意力。另外一种可能则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共同体,我们不再那么直线式地、坚定地把一个学者的言论与他所服务的国家政府的政策意图等同起来。倘若这个推测成立,则是一种难得的进步。

对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界而言,粮食安全将持续是在国内政策选择及中外交流两个层面都高度敏感的话题。如何使我们的研究有利于国家的政策选择,避免自信过头,将是一个长期性的挑战。

## 二、国际粮食市场靠得住吗?

“使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已经被中国政府确定为未来20年农业的政策目标。中国政府于2008年通过并开始实施的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将目标细化为2010年粮食产能达到1万亿斤,2020年达到1.1万亿斤(比现有产能增加1000亿斤)。2009年我国粮食产量为1.06万亿斤,首次实现近40年来连续6年增产。从历史轨迹看,1980—2005年的26年里,我国的粮食自给率有24个年份都在95%以上,1个年份(2001年)在95%以下,1个年份(2003年)在90%以下。<sup>①</sup>

但是,仅就粮食生产所必需依靠的自然环境而言,中国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易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持续30多年的华北地区干旱问题在未来10多年内仍不会有缓解迹象,而华北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小麦和玉米生产地,该地区的灌溉农业覆盖率已经超过了80%。“气候变化和极端气象灾害导致我国粮食生产的自然波动,将从过去的10%增加到20%,极端不利年景甚至达到30%以上。”<sup>②</sup>

上述规划能否实现,预测是否准确,并不在我们要讨论的范畴。从中不难得到的一个观察便是:要实现如此高的自给率目标,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所以,排除未来有必要依靠从国际市场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的选项,显然是不智的。

就耕地紧缺、人口密集、迅速工业化、城镇化等发展环节而言,今天的中国与1970—1980年代初的日本具有可比性。在追求粮食自给这个目标上,日本经历了一个“综合征”:一些有违愿望的现象同时发生,但又同时是整个社会的不同领域在正常变化的一部分;所以,只能如此。首先,由于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耕地被用于工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随着小汽车拥有量的增加,道路、高速公路和停车场的建设也从农业夺走大量宝贵的土地。当农民发现通过耕作土地不足以满足

① 朱剑红:《怎样增产千亿斤粮食?》,《人民日报》2009年11月5日,第2版。

② 郑国光:《科学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求是》2009年第23期,第48页。

其经济欲望时,经常是选择放弃对土地的依赖,另谋职业。其次,由于快速工业化夺走了农村的劳动力,在同一块土地上进行双季的机会随之减少。再次,由于整体人口收入提高,食物花色品种增多,对于水果和蔬菜的需求增加,农民把种植谷物的土地转到种植这些附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sup>①</sup>

为了使粮食(特别是大米)自给率维持在一个尽可能高的目标,日本政府穷尽了国内和外交政策努力。这些政策中包括对进口大米征收778%的关税。不过,从1960到2005年间,日本的食品自给率从79%下降到了41%,同期日本的农业用地从600万英亩减少到463万英亩。<sup>②</sup>一个可以明确得出的结论便是:对整个社会而言,粮食自给率下降伴随着整个社会追求发展和进步而产生。

总之,不论是从维持粮食高产所必须依赖的自然条件看,还是将日本的粮食生产所走过的历程作为参照,我们都不可避免要为谷物进口量和进口比率的增加而做准备。

那么,国际粮食市场靠得住吗?回答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回顾建国后我国进口粮食的历史经历。

从建国到1971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解除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和禁运,20余年间,中国无法与资本主义世界正常地从事经贸往来。如果说,在1955年出版的国际问题评论还有事实基础称“禁运对中国经济并没有造成什么了不起的不可克服的困难,”<sup>③</sup>到了1959年,国内情势出现了根本性变化。1958年“大跃进”运动失败后,出现了三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突破禁运和封锁成了不可避免的选择。全国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400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低于1951年产量,1961年虽略有回升但也只有2950亿斤。粮食、食油、肉蛋等维持日常生存的必需品供应持续极度紧张,形成了全国性饥荒。<sup>④</sup>

所以,政府设定了进口粮食的目标:1961年500万吨、1962年350万吨至400万吨。通过多方努力,包括利用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香港社会的各种爱国力量的帮助,中国成功地从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法国、西德、意大利获得了粮食进口。1961年,“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进入中国”。<sup>⑤</sup>1962年,国内粮食生产形势开始好转,进口的压力减弱。

作为当代中国史上中外交锋的一个环节,中国度过了美国发起的禁运和封锁,

---

① 莱斯特·R·布朗:《地球不堪重负:水位下降、气温上升时代的食物安全挑战》,林自新、暴永宁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② Kazuhito Yamashita, “Rice Policy Reforms in Japan: seek food security through free trade,” The Association of Japanes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http://www.jiia.or.jp/en/commentary>.

③ 史一涛:《应该是取消“禁运”的时候了》,《世界知识》1955年第19期,第15页。

④ 尚长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紧急救灾措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50页。

⑤ 尚长风:《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研究》,《中共党史资料》2009年第3期,第157页。

这一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可圈可点。<sup>①</sup>但是,从这一段历史中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经常称道的“人道主义”,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其权重是无法改变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思维的主导地位功能的。在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订的时候,美国民主党还被指责“丢失了中国”。1961年,肯尼迪赢回执政地位时,美国政府依然没有因为中国的严重饥荒在蔓延而伸出人道主义之手。出于反共、弱化中国援越(南)抗美的能力之目的,肯尼迪政府选择了维持对中国的粮食禁运。<sup>②</sup>

事实上,在中国粮食供应最困难的三年间,美国政府一方面不惜与其他西方粮食出口国交恶而努力协助自己国家的农民出口粮食,却同时阻挠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向中国出口粮食。

回顾这段历史,加拿大政府1950年便开始和美国在粮食出口等一系列课题上的分歧,是中国在1961年顺利从加拿大进口小麦、玉米等国内急需的粮食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sup>③</sup>加拿大首先“大胆挑战”美国对中国在非军事产品领域的贸易禁运,使得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也开始有了与中国从事有限的贸易的国际基础。这一时期,中国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得以从日本进口化肥和化肥生产设备,对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粮食产量,发挥了改变命运的划时代作用。<sup>④</sup>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前,围绕粮食而展开的外交收获,是美国与其盟国间的外围性、偶然性因素而不是内在性、结构性因素在起作用。

自1971年中美政治关系改善以来,中国的粮食进口再没有遭遇美国独自或联合组织进行的禁运。尽管如此,农业和农产品在大国内政、外交两个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没有改变。由于中美两国关系的结构性不稳定,对于中国而言,影响未来粮食供应的国际渠道是否畅通的基本因素依然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取向变化。所以,如何避免粮食贸易再次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工具之一,是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必须继续跟踪努力的课题。

### 三、关于本期专题

粮食是近几年与其他几个全球性挑战孪生的话题:环境、能源、金融、气候变化。这些话题都无一例外地关乎中国,关乎中外关系。

① 董志凯:《五十年代我国反对“封锁、禁运”的斗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19页。陶文钊:《禁运与反禁运:五十年代中美关系中的一场严重斗争》,《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第179—193页。

② 牛大勇:《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研究(1961—196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论文,2000年。

③ Greg Donaghy and Michael Stevenson, “The Limits of Alliance: Cold War solidarity and Canadian Wheat Exports to China, 1950-1963,”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83, No. 1, Winter 2009, pp. 29-50.

④ Chad Mitcham, *China'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and Japan, 1949-79: grain, trade and diplomacy*, London: Routledge, 2005.

在组织课程教学和准备参与中外交流的过程中,笔者很快发现,中国学者们讨论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从经济、贸易、技术等视角进行。也出现了一些从政治的角度讨论全球粮食以及粮食的中外互动的努力。<sup>①</sup>很可能是由于30多年来,粮食进口的渠道没有受到蓄意干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粮食供应和农业,也没有出现此前所惧怕的“全盘皆输”局面,极少见到从国际问题研究的视角关注粮食问题的学术成果。与之相对照的情形是,类似粮食禁运等国际问题研究本该能够做出贡献的话题,经济学界却多年来在反复讨论。<sup>②</sup>

伴随着粮食话题成为热门,几本以揭秘西方粮食阴谋论为卖点的译著成了畅销书。<sup>③</sup>这些书籍在试图告诉读者:西方少数人在围绕粮食而进行的一场不为多数人所周知的战争;这种战争符合西方国家政府“不战而屈人之兵”目的,其终极目标是控制世界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空间。这些书的扉页,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个似乎是无可辩驳的认知: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民;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类似的阴谋论,就吸引读者注意力而言,显然有其独到之处。但是,阴谋论满足不了决策讨论所需求的科学性要求。就像本文第一节所提到的一样,当年莱斯特·布朗在中国所受到的批判,便是阴谋论思维影响的直接后果:盲目排斥。

与阴谋论相对应的,是另外一种直线式思维逻辑:只要我们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奉行合作双赢的理念,用中国的资金、人力、消费市场的优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粮食生产,也是应对国际粮食贸易不确定因素的良策。至于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则仅包括:目的地的农业资源状况,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经济水平和发展速度,粮食消费变化,生产状况和贸易状况。<sup>④</sup>过去数年来,有关中国在国外“租地种粮”的各种指责,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在粮食这个敏感问题上,事情远远比我们的教科书中所试图传授的推论复杂。

之所以组织本期的几篇文章,是基于以下认知:粮食等资源的跨国流动,首先受制于地理、人口、经济、技术和商业环境的变化。跨国政治在何种情形下如何影

---

① 胡莹:《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看世界粮食危机》,《特区经济》2009年第4期,第19—21页。周立:《粮食主权、粮食政治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世界环境》2008年第4期,第36—39页。胡岳岷:《中国粮食安全的政治经济学》,《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第28—34页。

② 杨正兵、董葶:《小麦贸易格局的演变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基于“粮食禁运”的理论分析》,《中国农学通报》,第25卷,2009年第17辑,第320—325页。胡迎春、刘卿:《粮食禁运的风险与中国粮食安全的政策选择》,《中国农垦经济》2003年第8期,第14—17页。卢锋:《粮食禁运风险与粮食贸易政策调整》,《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第32—47页。

③ [英]拉吉·帕特尔(Raj Patel):《粮食战争:市场、权力和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郭国玺、程剑峰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美]威廉·恩道尔(William Engdahl):《粮食危机:运用粮食武器获取世界霸权》,赵刚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④ 例如,白石、梁书民:《世界粮食供求形势与中国农业走出去战略》,《世界农业》2007年第11期,第5—9页。



响某种资源性商品的跨国流动,往往不易为业界之外所掌握。国际政治学者的研究,因此而难免产生似是而非的研究结论。

对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界而言,学习与研究资源的跨国流动问题必须面对的挑战之一,是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我们的相关知识传统并不坚实。改革开放前,我们对境外资源市场演变的描述和分析,严重地受到那个时代对外关系的意识形态制约。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也是欧美学术界研究资源安全的重要历史参照点——两次石油危机,都没有对中国的商品进出口产生大范围的影响;因此,也就没有出现多少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为出发点,思辨性地讨论国际资源方面的学术成果。改革开放以来,获得境外资源是一个政治和外交挑战,也不过是几年前才开始流行的意识。与此同时,通过翻译和介绍,我们得以了解不少来自欧美的有关资源的国际政治的研究成果,但是,翻译代替不了研究。

本集的三篇文章,其范畴的设定都局限在中外关系。其中的每一篇,都只是一个初步报告,是真正意义上的抛砖引玉。

感谢参加本项目的三位同学,没有他们的耐心,本集文章就不可能成型。感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的赵梅女士,是她的提议和鼓励才促使我有勇气开始尝试一个全新的挑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缉思教授、袁明教授、王逸舟教授等同事对整个项目的设计、布局,起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当然,包括本文在内的本集文章中的错误和不足,由于学生们系应老师的要求而为,全部责任都由我一个人承担。